

## 王嘉里访谈

2016年3月23日

本文为节选，原文“伦敦 Gang: 群而不党”登载于“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公众号

*王嘉里：在年幼时想象自己长大后是什么样子？*

刘辛夷：如果“年幼时”是指上小学以前，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可能期间我做过太多次改写，导致最初的想象已经无从认定了。不过，比较明确的可能就是一个有正当理由傻乐的角色，还能从自己从事的事情中得到乐趣。

*王嘉里：这两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刘辛夷：或许是因为习惯了巨量的信息干扰和环境里的不安全感，我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创作的专注度反而变高了些。这同时也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或许还证明了艺术能够继续反哺对自己对待生活的设定方式。

另一个改变也与之相关。我一向都喜欢说时间有限（好似自己对此特有认识，但谁都看得出我其实是反应慢，动作更慢），但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时间的有限性”的真正重点不在于分秒必争或者效率成本之类的，而是在于所有眼下异常热烈的新事物，仅有非常有限的时间，在被更新更热烈的事物取代和遗忘之前，努力证实自己存在过的那一丁点历史意义。

*王嘉里：最希望改变 / 最不希望改变的事情是什么？*

刘辛夷：这两个问题可以看作一个认识论话题。

自打我出国留学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深切体验到“认识世界”是如此之难，以至于我觉得相比于那些看得到“改造世界”（例如新自由主义

的全球化工程，中国发展主义观念下的阶层跨越，大基建，传统文化输出之类）能够在此生获得不断理解这个“后技术”世界的方法，已经是足够艰巨的任务了。从这点出发，我一直坚信，“认识世界”已经变得比“改造世界”更具挑战性，文化工作者所能影响的领域，也应该是介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之间的“解释世界”。

但我近年开始体会到，“改造世界”是“认识世界”很可能是同步发生的，未必会有一先一后的步骤选择机制，预计也很难仅仅留在个人层面的探讨。因为即便是关于当代艺术和哲学研究这种高度小圈子化的实践活动，也必然有关于一辈人所整体经历的历史经验和对这种历史经验所作出的连续性的文化反应。举个例子说，2011年开始的蔓延全球的占领活动就是一个明证，即便是参与其中的年轻人也要到比较晚近才会明白原来以为的发声运动其实在当时当刻就开始了型塑未来政治的进程；再例如，国内在2011年左右开始的年轻化艺术（不是年轻艺术家）浪潮，确立了如今的艺术圈的游戏规则。不论方向上是否将偏离本意，存有改变的意愿可以看作是人的本能，从改变认识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开始改造了自身对未来的想象，并在不自觉中推动事物的变化。